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五四百年

### 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 ——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陳序存

國家危難之際，學生們走出平靜的書齋，奮起抗爭，積極干政，與當局發生激烈碰撞，此所謂「學潮」。學潮古已有之，只是在二十世紀中國得到了發揚光大，成了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與風向標誌。這裏既有「三代遺風」的歷史記憶，但更多的是西學東漸之後教育體制、思想潮流以及政黨鬥爭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以來，學潮罕見有好結局的，或孤掌難鳴，或悲壯慘烈，雖在政治史上留下了印記，當事人卻大都只能仰天長歎。「五四」是個例外，相對來說，整個溫順平和多了——政府逮捕了學生，但很快釋放，且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學潮於是完滿收官。學生呈現了強大的理想與激情，政府也展示了某種誠意，雙方妥協的結果，使得「五四」成為中國歷史上犧牲最小、成果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學潮。

1919年5月4日三千大學生天安門前集會遊行，那只是冰山一角。這次學潮最值得注意的，不在其規模或激烈程度，而在於「有備而來」。這裏指的不是有綱領、有組織、有領導（恰好相反，此次學潮的參與者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傾向，但無統一立場與領導），而是制度基礎以及精神氛圍已經釀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巴黎和會不過是一個觸媒，或者說一陣不期而至的「東風」，使得啟蒙思潮下逐漸成長起來的大中學生們的「愛國心」與「新思想」噴薄而出。而由此樹立的一種外爭主權、內爭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喚着此後一代代年輕人。

在這個意義上，就「五四」談「五四」是不得要領的，必須拉長視線，或往後梳理一百年來「五四」因不斷被紀念與闡釋，而成為一種重要的思想資源；或往前追溯晚清以降「新文化」是怎樣逐步積聚能量，並最終破繭而出的。

關於五四運動的時間跨度，確實「是一個混亂的問題」<sup>①</sup>。目前的主流意見，或從《新青年》創辦的1915年、或從《新青年》與北京大學結盟的1917年說起；至於終點，或1922年，或1925年，也都各有說頭。本文堅持我一貫立場，談「五四」而從晚清說起，甚至平視晚清與五四，將二者「混為一談」<sup>②</sup>。

## 一 危機感的積累與傳播

作為一個文化/政治符號，「五四」從一誕生就被強烈關注<sup>③</sup>，近百年來更是吸引無數研究者的目光。也正因此，每代學人談「五四」，都不是無的放矢，都會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與感懷。對此，我的解釋是：「『五四』對我們來說，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sup>④</sup>

本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想到在與年輕一輩接觸時，碰了個軟釘子：學生們說，那是你們的姿態，很美好，但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談「五四」，照樣活得好好的。凡在大學教書的，大概都會感覺到，今天的大學生乃至研究生，與十年前、二十年前大不一樣。或自認已經超越，或坦承無法進入，反正，「五四」不再是年輕一輩急於體認、溝通或對話的對象。早些年還會嘲笑陳獨秀的獨斷、錢玄同的偏激，或者胡適的〈兩隻蝴蝶〉，如今連這個都懶得辯了。似乎，「五四」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除非撰寫專業論文，否則沒必要再糾纏。

二十年前，有感於五四運動「只剩下口號和旗幟」，我努力勾稽各種細節，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十年前，針對國人對於「連續性」的迷信，我努力分辨「大至人類文明的足跡，小到現代中國的進程，都是在變革與保守、連續與斷裂、蛻化與革新的對峙、抗爭與掙扎中，艱難前行」<sup>⑤</sup>。今天談論「五四」的最大障礙，則在於年輕一輩的「無感」。雖然也常起立唱國歌，但所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早就被拋到了九霄雲外。相信「偉大復興」就在眼前的年輕一輩，很難體會百年前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

講文學史時提及五十七則〈吳趼人哭〉，以及劉鸚《老殘遊記》開篇的危船，或眾多文人學者認真談論「亡國滅種」的可能性，學生們會覺得很可笑，怎麼會如此杞人憂天呢？殊不知，那是晚清及五四兩代人真實的感受。講授此類課程，第一步是借助檔案、詩文及圖像，把學生們從太平盛世的夢幻中警醒，拉回到那風雨如晦的年代，這才可能有設身處地的閱讀與感受。就好像從來豐衣足食的人，你要他/她深刻體會「飢餓」的感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這一步必須跨過去，否則很難讓已被「厲害了，我的國」洗腦的年輕一輩，真正理解晚清以降無數愛國志士的思考與表達。

那可不是平靜書齋裏的玄思，而是危機時刻的文化及政治選擇。首先是一代人不可抑制的危機感的萌現。「這種自我懷疑從傳統政治秩序的外表向內核的深入，可從十九世紀後半期改良主義思想的逐步展開中清楚地得到證明。」<sup>⑥</sup>任何時代都有陽光照不到的角落，也都有不討人喜歡的梟聲。問題在於，甲午戰敗以後的中國，其危若累卵的局面被逐漸揭示。經歷戊戌變法失敗、庚子事變爆發、辛亥革命落空、袁世凱稱帝等眾多生死攸關的關卡，平心而論，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不算是近代中國最為嚴重的危機。

這就說到危機感的累積與傳播。一次次國家危機，累積而成迫在眉睫的亡國之憂；而個別先覺者的心理感受，只有傳染開去，才會成為真正的社會

危機。從晚清到五四，這種對國家失敗的不滿與怨恨，透過各種大眾傳媒與文學作品，得到廣泛的傳播。所以，與其說巴黎和會是中華民族最危險、最屈辱的時刻，不如說因新媒體的產生，危機意識得以迅速蔓延；因新思潮的蕩漾，年輕一輩的愛國心被喚醒；因新教育的壯大，大中學生作為一種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單純的危機感並不構成政治變革的強大動力，必須是新的力量及可能性出現，方才可能讓個體的精神苦悶轉為群體的積極行動。戊戌變法失敗後，眾多新政被取消，唯獨京師大學堂照樣開辦。雖然一路走來磕磕碰碰，但晚清開啟的廢科舉開學堂，不僅在教育史、而且政治史上，都是重大的突破。二十年後，走上街頭表達政治願望，推進五四運動的，不僅是北大學生，還有眾多師範、女學以及受過教育的外省青年。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陳獨秀的〈敬告青年〉以及李大釗的〈青春〉，並非泛泛而論，而是特指受過教育的、有可能被喚醒的、充滿理想與激情的青少年。

胡適晚年多次將五四運動稱為「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因為「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sup>⑦</sup>。但在我看來，文化與政治之間，本就剪不斷、理還亂，以為靠當事人的主觀意圖就能保證文化運動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那實在過於天真<sup>⑧</sup>。所有文化及政治運動——尤其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學潮，一旦啟動，受各種力量的牽制而變幻，最終往哪個方向發展、在甚麼地方止步，非發動者所能預測與控制（即便「偉大領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都無法做到收放自如）。

所有的文化/政治運動，都不是無菌的實驗室，絕難精密規劃。某種意義上，「摸着石頭過河」是常態，設計完美的社會改革，往往事與願違。晚清起步的新文化，一腳深一腳淺，走到了「五四」這個關口，拐一個彎，借助「愛國」、「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迅速獲得了社會認可。這確實不是梁啟超或陳獨秀、胡適等人事先設計好的，而是因緣際會，師生攜手，竟然打出一個新天地。不過，若將五四運動講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井井有條的故事，反而顯得不太真實，也不可愛。在我看來，這屬於「危機時刻」的當機立斷，所有決策未經認真細緻的路徑推演，並非當事人預先設計好的。情急之下，有甚麼武器操甚麼武器，哪個理論順手用哪個，正是這種「慌不擇路」，決定了晚清及五四那兩代人的閱讀、思考與表達。

## 二 雜覽與雜學的時代

作為「過渡時代」，晚清及五四的最大特徵是中西混合、新舊雜糅。就像李伯元《文明小史》描寫的，活躍在上海灘上的賈子猷（假自由）、賈平泉（假平權）、賈葛民（假革命）們，因私欲及眼界所限，往往將真經唸歪了。比如，以西餐標榜新潮，以為這就是文明時代的標配。晚清小說及畫報中，因而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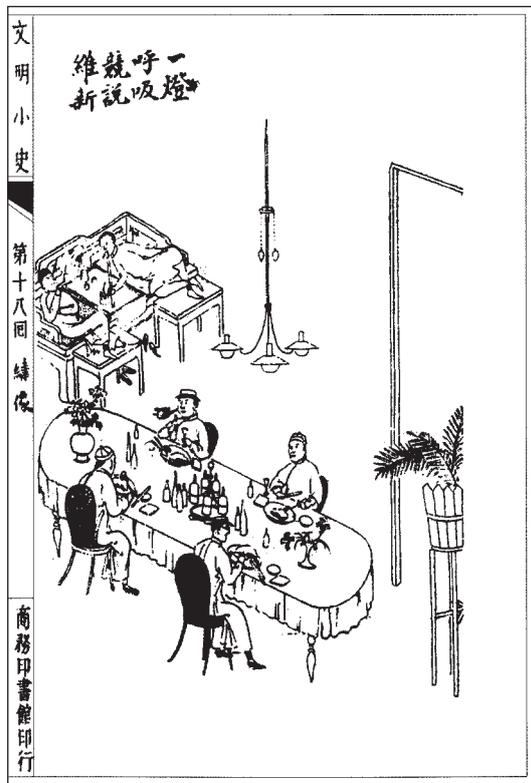
常出現番菜館的招牌以及吃西餐的場景。《文明小史》第十八回(上)的插圖很有戲劇性：前景吃西餐，後景抽鴉片，二者同台競技，且有很好的經驗交流。小說描寫此「奇觀」，插圖將其直觀呈現，再加上自在山民的評語：「以吃鴉片為自由，以吃牛肉為維新，所謂自由維新者，不過如此，大是奇談。」<sup>⑩</sup>這當然是惡謔。不過，在時人眼中，西方文明的傳入，確實伴隨着飲食方式的雜交與變異。因此，說「西餐」是一種顯而易見、觸手可及、好吃好玩的「西學」，也未嘗不可。

隨着人員、物資以及文化交流的日漸頻繁，飲食的多樣化是必然趨勢。若將這種趨勢稱之為「雜食」，則應包括原料、製作、品味乃至就餐方式等。與之相對

應的，是學習方式的變化，即「雜覽」逐漸成為主流。從雜食到雜覽，再到「雜學」、「雜家」，可以看出整個時代的生活及閱讀風向。

先有考試方式的變化，後是科舉制度的廢除，傳統中國讀書人的「皓首窮經」，失去了制度保證，自然迅速衰落。隨之而來的，是努力適應瞬息萬變的新時代，閱讀因而變得急切、隨意、零碎與偶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新式學堂剛剛起步，到底該如何教、怎麼學，大家都沒有經驗。單看章程，如《欽定高等學堂章程》(1902)、《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1902)、《奏定高等學堂章程》(1903)、《奏定大學堂章程》(1903)等，規劃嚴整，像模像樣，可那都是抄來的。若大學堂裏的「文學科大學分九門」，含中國史、萬國史、中外地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文學等學門<sup>⑪</sup>，完全是紙上談兵。因為，「京師大學堂的各分科大學，正式成立的時間遲至1910年；而且，文科大學中真正開設的，也只有中國文學和中國史學兩門」<sup>⑫</sup>。而且，接下來好幾年，因戰亂及經費短缺，無論北大還是其中國文學門，都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sup>⑬</sup>。最高學府尚且如此，其他學校可想而知。專上學校的學生本就不多<sup>⑭</sup>，看當年的教材及課程設計，學校實在沒能提供系統且良好的教育<sup>⑮</sup>。

舊的教育體制已被打破，新體制及師資建設仍在路上，晚清至五四時代的青年學生，更多地得益於自由閱讀，而不是學校的系統訓練。那個時代的



《文明小史》第十八回的插圖很有戲劇性：前景吃西餐，後景抽鴉片。(圖片由陳平原提供)

讀書人，大都不為學堂章程所局限，閱讀時兼及中西、新舊、雅俗，故呈現博而雜的知識結構。即便有機會出國留學的，真拿到專業學位且沒有轉行的，實在少得可憐。那是一個不怎麼「講專業」的時代，大家都渴望獲得新知，「雜覽群書/報」成為常態。這既是他們的長處，也是其短處。

與此前根柢六經的儒生不同，也與此後術業專精的學者迥異，這是雜食/雜覽/雜學的一代，教育體制及新式學堂的稚嫩，決定了那代人的知識結構——視野開闊，博採旁收，思維活躍，淺嘗輒止。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傳統中國「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的雜家。作為一個哲學流派，春秋戰國時代的雜家，名聲並不顯赫。而後世文人學者談「雜家」，更是將其與「顯學」、「大道」、「通才」、「純儒」相對立，帶有明顯的貶抑意味。單就不拘門戶擁抱新知這一點而言，晚清及五四那兩代讀書人，頗有雜家之風。讀書以廣博而非深邃見長，學問切己而不是精細，立說不求圓融，多有感而發，故稜角分明、生氣淋漓。至於說獨創性或體系嚴密，則又未必。

晚清的梁啟超以及五四的周氏兄弟，應該說是那個時代讀書最認真，視野最廣博，著述也最為勤奮的了。關於梁啟超某文某書是否抄襲的爭議由始已久，但學界一般認為此乃過渡時代的必然產物，作者以「覺世」而非「傳世」為主要標的，對於外國的思想、學說、文風多有借鑒，不能以今天謹守知識產權的標準來衡量<sup>⑮</sup>。至於魯迅1907年撰寫並刊登在第二年第二、三期《河南》上的〈摩羅詩力說〉，學界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不說文字古雅或立場激進，單是其視野之開闊，也都令人震撼。表彰十九世紀歐洲眾多「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的傑出詩人<sup>⑯</sup>，評價大致準確，若無廣泛的閱讀與借鑒，那是不可想像的<sup>⑰</sup>。周作人在北大講授《歐洲文學史》，從1917年9月22日上午開始起草講義，到1918年6月7日晚上完稿，再到同年10月列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三」由商務印書館刊行，實在可用「神速」二字來形容。多年後，作者謙稱：「這是一種雜湊而成的書，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國文學史，文人傳記，作品批評，雜和做成，完全不成東西，不過在那時候也湊合着用了。」<sup>⑱</sup>該書論述確實不夠深入，頗有將前人成果「拿來作底子」的，但這畢竟是中國人編寫的第一部歐洲文學史，代表着當時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因而依舊值得表彰<sup>⑲</sup>。

經學時代已經過去了，新時代的讀書人，即便有教材或辭典的引導，也都得靠自己摸索，讀書駁雜於是成了那代人的共同特點。在這個意義上，「雜覽」、「雜學」或「雜家」，不再是貶義詞。1944年周作人撰〈我的雜學〉，開篇引《儒林外史》第十八回關於「雜學」、「雜覽」的議論，接下來是先抑後揚的引申發揮<sup>⑳</sup>：

我平常沒有一種專門的職業，就只喜歡涉獵閒書，這豈不便是道地的雜學，而且又是不中的舉業，大概這一點是無可疑的。……至於說好的，

自然要感謝，其實也何嘗真有甚麼長處，至多是不大說謊，以及所說多本於常識而已。假如這常識可以算是長處，那麼這正是雜覽應有的結果，也是當然的事，我們斷章取義的借用衛先生的話來說，所謂雜學到是好的也。

聽周作人細說自家閱讀古文、小說、古典文學、外國小說、希臘神話、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生物學、兒童文學、性心理學、醫學史、妖術史、鄉土研究、江戶文物、浮世繪、俗曲、玩具、外國語、佛經等方面的著作，實在驚歎其涉獵之廣與體會之深。這當然只是特異之才的知識地圖，但也不妨將其作為一個時代閱讀風氣的象徵。如此鄙視世人視為正途的「舉業」，而刻意強調「凡人」與「常識」，且理直氣壯地為「閒書」與「雜覽」正名，可見新時代的閱讀趣味。緣於知識飢渴與選擇自由，不受新舊教條束縛，任意跨越學科邊界，以思想通達見長，這便是雜學的精髓，也是晚清及五四那兩代人最值得珍惜的閱讀經驗。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沒有完美的治國良方，也沒有現成的閱讀指南，只能自己摸索着前進。考慮到教育環境、書籍流通、外語水平以及翻譯出版等限制，晚清及五四那兩代人接受新知時容易望文生義，且多穿鑿附會，這都可以諒解<sup>②</sup>。危機時刻的閱讀與思考，不同於純粹的書齋學問，但求有用，不求系統全面；既然是飢不擇食，那就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左右黑白，哪個適應用哪個。後人讀其著述，會發現很多熟悉的詞彙、思路與學說，你可以追根溯源，但不宜過份坐實。隨着學術的專業化以及數據庫的廣泛應用，理解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閱讀視野，將變得愈來愈容易。隨之而來的，就是警惕用力過度，將先賢興之所至的「雜覽」，說成了旗幟鮮明的「專攻」。在我看來，今人談論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既不要誇大他們的學問與智慧，也別低估他們求知的願望與熱情——那種上下求索的勇猛與果敢，此前沒有，此後也難以為繼。

### 三 綱常鬆弛的得失

1920年，周作人談及為何引進希伯來思想與文藝，特別強調雜覽對於破除中國人固定思維的好處：「中國舊思想的弊病，在於有一個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發展；現在我們用了多種表面不同而於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調劑下去，或可以得到一個中和的結果。」<sup>②</sup>此前一年，蔡元培則感歎「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sup>③</sup>，對於持異議者，輕者逐出教席，重者消滅肉體。如今，借助於引進西方的大學體制，蔡先生希望建立自由思想的「安全島」。一說思想的定於一尊，一談學術之專制積習，雖沒點破，實際上都指向學術及思想背後的政治體制。

對於「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的中國人<sup>24</sup>，蔡元培力主兼容並包。〈《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強調「兼容」不同學術流派，如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之寫實派與理想派、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則突出「兼容」不同政治主張，即大學教員以學術造詣為主，並不限其校外活動<sup>25</sup>。這裏有蔡元培的大學理念與個人修養，更與那是一個綱常鬆弛的時代有關。

為了保持大學獨立，北大校長蔡元培八次辭職兩次歐遊，以此抗拒政府指令，追討辦學費用。此等舉措給北洋政府很大壓力，讓其內火中燒而又有苦難言，還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那是因為，蔡元培長校的十年，清廷已被推翻，民國根基未穩，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軍閥混戰，教育經費無着，令大學校長極為頭痛。但事情也有另一面，那便是處此新舊轉化之際，沒有不可逾越的邊界，也沒有不可挑戰的權威，乃「嘗試」各種新制度的最佳時刻。等到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推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只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審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更是岌岌可危<sup>26</sup>。

以辛亥革命為界，此前十五年與此後十五年，都屬於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的時期。可正是這三十年，思想比較寬鬆，言論相對自由。若以學術思想為例，此前的「經學時代」與此後的「主義時代」，都力主輿論一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某種意義上，晚清及五四的眾聲喧嘩、百家爭鳴，如此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盛況，不是拜皇帝或總統所賜，也不是制度設計使然，而是因中央集權無法落實，各種力量互相掣肘，控制乏力，縫隙多多，於是各種思想學說自由競爭，尚未出現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沒有誰能一手遮天，「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於是暫時無法發揮作用。

回看歷史，晚清報人的理想性與獨立性，超乎你我的想像。秋瑾因謀反而被朝廷處死，不僅上海報紙，幾乎所有重要媒體，都對朝廷此舉持批評態度。接下來幾年，媒體上不斷出現談論、表彰乃至紀念秋瑾的圖與文，這在以後是不可想像的<sup>27</sup>。晚清輿論的相對自由，放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中國史看，是個奇蹟。但必須說明，不是朝廷主動開放報禁，而是他們沒有能力控制<sup>28</sup>。應該這麼說，晚清及五四思想文化潮流的活躍，和出版及新聞的相對寬鬆有直接關係。

不管「高調」還是「低調」，清末民初從事報業及出版的啟蒙者，都值得充分尊重。歷史上，中國人對異端的容忍度極低，統治者對輿論的控制極嚴。有了《大清報律》（1908）、北洋政府《報紙條例》（1914）、南京國民黨政府《出版法》（1930）等，雖限制多多，但有法總比無法好，起碼讓你知道如何規避。那時代，確實有不少報人為言論自由付出血的代價，比如創辦《啟蒙畫報》、《京話日報》及《中華報》的彭翼仲（1864-1921），1906年被清廷以「妄議朝政」的罪名流放新疆十年；而黃遠生（1885-1915）、邵飄萍（1886-1926）、林白水

(1874-1926) 更是因實踐自家的新聞理想而死於非命。即便如此，比起此前此後的輿論環境，晚清及五四時期還是最為寬鬆的。

1935 年底，魯迅撰《花邊文學·序言》，提及那時候寫作者的困境<sup>29</sup>：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甚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

凡寫作者，重讀魯迅此文，罕有不一身冷汗的。可讀晚清及五四時期報章，最大的感受是，作者的見解不一定高明，但大都直抒胸臆，落筆時很少禁忌。

此前帝制風光，此後主義流行，只有中間這三十年沒有「大一統」的可能性——不是統治者不想，而是做不到。「城頭變幻大王旗」，對於因戰爭而引起的「思想混亂」，周氏兄弟並不特別反感。魯迅曾將魏晉文章概括為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後兩者得益於「文學的自覺時代」，前兩者則是亂世中綱常鬆弛，「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sup>30</sup>。周作人更直接了當地指出：「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於王綱解紐的時代。」只有在亂世，才可能處士橫議，百家爭鳴，那「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的「言志的散文」，才得到真正發達<sup>31</sup>。這也是周氏兄弟不太談論「盛唐氣象」，而對王綱解紐故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故文章瀟灑的魏晉六朝特感興趣的原因<sup>32</sup>。

缺乏強大的中央集權，地方自治又沒有真正發育，晚清及五四前後的中國，社會激烈動盪，經濟發展乏力，讀書人生活窘迫，做學問也不夠從容。只是因文網鬆動，思想格外活躍，尤其是其特立獨行、勇於抗爭，值得後人欽羨。

比起閱讀上的雜覽、政治上的抗爭來，晚清及五四的懷疑精神更有普遍意義。借用魯迅筆下狂人的追問：「從來如此，便對麼？」<sup>33</sup> 晚清及五四的「疑今」與「疑古」，兼及文化、政治與學術，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基於對當下中國的強烈不滿，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歷史與現狀。敢於並善於懷疑，「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持強烈的自我批判立場，此乃晚清及五四的時代特徵，也是其最大的精神遺產。

中國歷史上不乏異端人士，但他們之挑戰主流意識形態，其思想的參照系仍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內部。晚清和五四那兩代人不一樣，他們側身古今中外的夾縫中，其選擇不一定正確，但掙扎的痛苦、體會的真切、思考的深刻，前人後人都難企及。我們今天的好處是，曾經的偶像（西方或西學）出現明顯的裂痕，可以有較大的審視距離與選擇餘地。既不要像五四那樣，拿中國最

差的東西和歐美最好的東西比較，也不要反過來，拿中國最好的東西與西方最不值得稱道的東西對話。明白西方或西學不是鐵板一塊，科學技術、政治制度、思想學說，哪些是好東西，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哪些則必須拒斥乃至鬥爭，這種能力，今天比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我之所以再三強調和「五四」保持對話，不是說那裏有理想的答案，而是將其作為磨刀石，砥礪思想，艱難前行<sup>⑳</sup>。

危機時刻的閱讀與思考，會因心情峻急而有所扭曲與變形，但那種壁立千仞的姿態以及自我批判的立場，值得後人認真體味與尊重。晚清及五四那兩代人思想的豐富與複雜，背後是選擇的多樣性。北伐完成，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這種混沌初開、思想多元的局面一去不復返。國共兩黨的政治立場天差地別，但思維方式很接近，都主張兩極對立，黑白分明，不喜歡多元化的論述，討厭第三條道路，於是，眾聲喧嘩的局面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黨派與主義之爭，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sup>㉑</sup>。

#### 四 以報章為中心的思考與表述

既然無路可退，那就摸索前進，允許試錯——晚清的憲政改革，民初的帝制復辟，五四的批儒反孔，還有聯省自治的提倡、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共產學說的輸入等，無數奇思妙想都能順利出爐，且吸引公眾目光，甚至成為時尚話題。我稱之為「慌不擇路」，其實並非貶義。比起此前此後若干看起來很美實則很糟的社會設計，晚清及五四的四處出擊、徘徊無地，乃民間覺醒及自我拯救的努力。也就是說，改革動力主要來自民間，不是朝廷或中央政府主動出擊，自上而下地發布政令，而是眾多先知先覺者借助大眾傳媒搖旗吶喊。

1922年，新文化主將胡適撰寫〈我的歧路〉，其中涉及政治、媒體與教育之關係<sup>㉒</sup>：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能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在反省戊戌變法、庚子事變以及辛亥革命的慘痛教訓時，時人多意識到文化教育及思想啟蒙的重要性。這也是《新青年》的橫空出世且能得到廣泛支持的原因。可所謂「出版界的孤陋」與「教育界的沉寂」，那只是相對而言。晚清報業的發展以及傳媒對於社會思潮的引領，學界其實多有論述。這裏想強調的是，這是一個以報章為主要思考及表達方式的時代。

不管你從哪個角度編「五四文選」或「新文化讀本」，主要文本均來自報章，像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樣成體系的著述，是個特例。相對於書籍、辭典或教科書，那個時代的報章更多地承擔了傳播新知、啟發民眾、介入現實的重任。眾多活躍的新文化人，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喜歡在報紙雜誌上發文章，甚至直接參與報章的編輯製作。以一代名刊《新青年》為例，幾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業之前，都曾參與報刊這一新生的文化事業，並多有歷練。廣為人知的，如陳獨秀辦《安徽俗話報》、蔡元培辦《警鐘日報》、吳稚暉辦《新世界》、章士釗辦《甲寅》、錢玄同辦《教育今語雜誌》、馬君武協辦《新民叢報》，高一涵編《民彝》、李大釗編《言治》、胡適編《競業旬報》、劉叔雅編



晚清及五四是一個以報章為主要思考及表達方式的時代。(資料圖片)

《民立報》、吳虞編《蜀報》，以及謝無量任《京報》主筆、蘇曼殊兼《太平洋報》筆政、劉半農為《小說界》撰稿，周氏兄弟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等刊作者並積極籌備《新生》雜誌<sup>⑩</sup>。對於新文化的提倡、創作與傳播，報章及出版明顯比大學或中學的課堂更直接，也更有效。北大之所以成為新文化的重要陣地，主要不是因為教授們的課堂講義或專門著述，而是《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的聲名遠揚。

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傳播媒介的轉變，決定了一代人的思考及表達方式。相對於此前以書籍為中心的時代，晚清及五四以報章為中心的思考與表述，呈現了瞬間反應、激烈表態、策略思維、思想草稿等特徵。以下略為申說。

以前意識形態穩固，經書可長讀不衰；如今社會動盪，世人求新求變，報章更能適應這一時代要求。報章的好處是迅速及時，努力解決迫在眉睫的難題，成功影響時代風氣，缺點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難以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一切都在流轉中，發言時不能默守陳規。不同於運籌帷幄的密室交談，也不同於居高臨下的廣場演說，報刊文章更多處於對話狀態——與時代對話、與讀者對話、也與論敵對話。必須看清上下文，了解各自論述的來龍去脈，方才能準確判斷其得失成敗。比如，《新青年》為何1916年2月起開始激烈批判孔教，很大原因是此前一個月，袁世凱令孔令貽繼承原衍聖公爵位外加郡王銜，此前兩個月，袁世凱廢除共和悍然稱帝，再往上追溯，則是此前兩年，袁世凱下令官僚百姓祭孔拜天。晚清章太炎「深惡長素孔教之說，

遂至激而詆孔」<sup>38</sup>，五四諸君則因袁氏稱帝而激烈反孔，二者異曲同工。晚清志士及五四新文化人對於作為帝國精神支柱的儒學傳統之質疑與批判，有諸子學興起、大乘佛學復蘇、儒家致用思想復興，以及六經歷史文獻化等思潮的影響<sup>39</sup>，但激於時變，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報章兼及思想探索、知識傳遞與文化啟蒙，文字淺俗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立場鮮明，以及表達的情緒化。1904年劉師培在《中國白話報》第六期上發表〈論激烈的好處〉，署名「激烈派第一人」。這裏的激烈，不僅是政治立場，更指向表達方式：「這一種著書、出版、演說的人，宗旨也要激烈。」為甚麼？因為「激烈方能使人感動，並發生影響」<sup>40</sup>。某種意義上，這是報章不同於著作的特點，無暇精雕細刻，也不追求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注重的是現場效應，且寄希望於互相糾偏。此前兩年，梁啟超撰〈敬告我同業諸君〉，專門討論報章為何「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關鍵就在於立論必須偏激<sup>41</sup>：

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在梁啟超看來，與其大家都求穩妥、周全，「相率為從容模稜之言」<sup>42</sup>，不如各走極端，以挑動國人之腦筋。讀晚清及五四時期的論戰文章，凡平正通達的（比如杜亞泉），都不如慷慨決絕的（比如陳獨秀）受歡迎。胡適雖不認同陳獨秀的武斷、喜歡罵人、「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sup>43</sup>、立說以「氣勢」而非「論理」取勝，但承認正是這種「老革命黨」的決絕姿態，使新文學事業得以摧枯拉朽般迅速推進<sup>44</sup>。

既然追求社會影響而不是文章自身的邏輯嚴密，那麼，論述時就不能四平八穩，最好能出奇制勝。因此，寫作時更多考慮「策略性」，而不是「分寸感」。1927年2月，魯迅在香港發表〈無聲的中國〉專題演講，提及<sup>45</sup>：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這段妙語廣為人知。不談具體問題（如白話文之通行是否得益於錢玄同廢掉漢字的極端言論），就思想方法而言，魯迅的解釋確實透出了新文化人寫作的某些底牌，對於我們理解那代人的立論方式及文章風格，很有啟發性。其實，類似的思考，多年前梁啟超已經涉及：正因有了革命之提倡，道民權，說變法，倡西學，便沒有多少障礙了<sup>46</sup>。陳獨秀說得更直白：「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後的結果是五元。……改新的主張十分，社會

惰性當初只能夠承認三分，最後自然的結果是五分。」<sup>④</sup>五四新文化人正是洞悉國民的保守性，先將話題推到頂點，碰到反抗，再退回合理的位置。如此求勝心切，更多考慮策略與效果，而不是宗旨與邏輯，落實到文章體式，必定偏於「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雜感」，而不是堂堂正正、自我完善的「論文」。如此劍走偏鋒，當初很有效果，只是隨着時代變遷，其負面效應逐漸顯示出來。

我曾借用留學生胡適「常用札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sup>⑤</sup>，推演到五四時期陳獨秀、錢玄同、胡適、魯迅、周作人等的「通信」與「隨感」。既然是「草稿」而非「定本」，不妨即席發言、橫衝直撞，《新青年》上最為激烈的議論，多採取這兩種文體<sup>⑥</sup>。若放長視野，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關於人類前途、文明進程、中國命運等宏大論述，都可看做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思想的草稿」。

正因身處危機時刻，來不及深思熟慮，往往脫口而出，不夠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堅其說，各種主義與學說都提到了，但都沒能說透，留下了很多的縫隙，使得後來者有很大的對話、糾偏以及引申發揮的空間。這種既豐富多彩、又意猶未盡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

### 註釋

① 參見周策縱著，周子文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6。

② 採取這一學術立場的，包括美國學者張灝和始終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我。思辨程度與論述方式不太一樣，但殊途同歸，都主張將1890年代至1920年代這三十年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與闡釋。參見陳平原：〈「新文化」如何「運動」——關於「兩代人的合力」〉，《中國文化》，2015年秋季號，頁53。

③ 歷史上難得有這樣的事件，當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傳播開去，且得到當時及後世讀者的廣泛認可。塵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報》上已刊出北大教授兼教務長顧兆熊（孟餘）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活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週評論》則刊出學生領袖、北大英文系學生羅家倫（毅）的〈「五四運動」的精神〉，5月27日《時事新報》上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同樣引人注目——「潮流」、「運動」、「精神」，關於「五四」的命名與定性竟如此及時且準確。此後一代代文人、學者、政治家及青年學生，便是在此基礎上建構有關「五四」的神話。

④ 陳平原：〈走不出的「五四」？〉，《中華讀書報》，2009年4月15日。

⑤ 參見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載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1999），頁687-720；〈何為/何謂「成功」的文化斷裂——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運動〉，《南方都市報》，2008年11月14日。

⑥ 張灝著，高力克、王躍譯：《危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7。

⑦ 參見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胡適口述自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頁206。

⑧⑨ 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130-31；8。

- ⑨ 參見薛正興主編：《李伯元全集》，第一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130。
- ⑩ 參見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頁588。
- ⑪ 參見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載陳平原、王守常、汪暉協作主編：《學人》，第十四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頁20。
- ⑫ 1912年5月3日，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校，嚴復於是成了北大首任校長。因爭取辦學經費沒有着落，加上教育部義正詞嚴的訓令，不擅政務的嚴復，留下一封〈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掛冠而去。接下來，走馬燈似的，從10月至12月，臨時大總統先後任命章士釗、馬良、何燠時為北大校長。原京師大學堂工科監督何燠時，接任北大校長後碰到一系列難題，先是學潮不斷，後又經費無着，再加上教育部規劃將北京大學與北洋大學合併，何校長1913年6月申請辭職，終於在11月獲批。任期不到一年的何燠時，同樣留下了一則反對停辦北大的呈文。至於1913年北大中國文學門的困境，參見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290-91。
- ⑬ 1919年5月4日那天參加遊行的，有來自北京十三所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3,000名左右。根據5月5日學生〈上大總統書〉的自述，以及約略與此同時的靜觀所撰〈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新調查〉（《申報》，1919年7月12日），這十三所學校共有學生7,430人。而當時北京有專上學校二十五所，按現有數字統計，學生約11,000人。這個數字，與5月4日那天學生遞交給美國公使的英文說帖的落款「北京高等以上學校學生一萬一千五百人謹具」大致相符。
- ⑭ 以北大中國文學門（系）為例，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個分水嶺，此前開設的課程很少，教材也都乏善可陳。參見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頁21-26。
- ⑮ 參見夏曉虹：《晚清的魅力》（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66-70；《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47-59。
- ⑯ 參見魯迅：〈摩羅詩力說〉，載《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99。
- ⑰ 參見北岡正子著，何乃英譯：《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與此類似的有〈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參見中島長文：〈藍本《人間的歷史》〉，《滋賀大國文》，第16、17卷（1978、1979年），頁118-27、52-62；宋聲泉：〈《科學史教篇》藍本考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頁143-50。
- ⑱ 周作人：〈五四之前〉，載《知堂回想錄》，下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426-27。
- ⑲ 參見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頁60、109。
- ⑳ 周作人〈我的雜學〉1944年4月至7月連載於上海《古今》半月刊，後全文收入《知堂回想錄》，作為第197至206節。此處引文參見周作人：〈我的雜學〉，載《知堂回想錄》，下冊，頁747。
- ㉑ 這點很像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知識界熱情擁抱西學，那時沒人細究諸多歐美思潮之間的內在矛盾，哪個順手就用哪一個。眾多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西方文學理論被混合使用，且隨意引申，以至時過境遷，再閱讀那些花裏胡哨的論文，會有眩暈的感覺。
- ㉒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載《藝術與生活》（長沙：嶽麓書社，1989），頁45。
- ㉓ 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11。
- ㉔ 參見蔡元培：〈傳略（上）〉，載《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頁332。

- ⑳ 參見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載《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頁210-12、267-72。
- ㉑ 參見陳平原：〈「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文匯讀書周報》，1998年6月6日；〈大學校長的理想與現實——蔡元培以退為進的抗爭策略〉，《新京報》，2018年1月20日。
- ㉒ 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286-325。
- ㉓ 關於《大清報律》的制訂、清政府摧殘報業的手段以及新聞界如何抗爭，參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頁947-61。
- ㉔ 魯迅：〈花邊文學·序言〉，載《魯迅全集》，第五卷，頁418。
- ㉕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載《魯迅全集》，第三卷，頁503-504。
- ㉖ 周作人：〈《冰雪小品選》序〉，載《看雲集》（長沙：嶽麓書社，1988），頁109-10。
- ㉗ 參見陳平原：〈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中國文化》，第15、16期（1997年12月），頁273-305。
- ㉘ 魯迅：〈狂人日記〉，載《魯迅全集》，第一卷，頁428。
- ㉙ 參見陳平原：《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14。
- ㉚ 胡適：〈我的歧路〉，載季羨林編：《胡適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467。
- ㉛④⑨ 參見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52-53；86-91。
- ㉜ 參見章太炎：〈致柳翼謀書〉（1922年6月15日），載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764。
- ㉝ 參見張灝：《危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頁14-28；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思想的衝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85-97。
- ㉞ 參見陳平原：〈激烈的好處與壞處——也談劉師培的失節〉，載《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66-89。
- ㉟④⑩ 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新民叢報》，第17號（1902年10月2日），頁5。
- ㊱ 參見胡適、獨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頁4。
- ㊲ 參見胡適：〈逼上梁山〉，載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頁27。
- ㊳ 魯迅：〈無聲的中國〉，載《魯迅全集》，第四卷，頁13-14。
- ㊴ 梁啟超說：「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以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參見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頁6。
- ㊵ 陳獨秀：〈調和論與舊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2。
- ㊶ 參見胡適：〈自序〉，載《胡適留學日記》，第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2。